

台湾族群问题 与政治生态

◎ 杨华基 /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台湾族群问题 与政治生态

◎ 杨华基 /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族群问题与政治生态/杨华基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211-06845-6

I. ①台… II. ①杨… III. ①民族历史—研究—台湾省
②政治制度史—研究—台湾省 IV. ①K280.58 ②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9289 号

台湾族群问题与政治生态

TAIWAN ZUQUEN WENTI YU ZHENGZHENG ZHI SHENGTAI

主 编: 杨华基

责任编辑: 江淑雅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闽侯永丰村

邮政编码: 350101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11-06845-6

定 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族群问题是当今最敏感的世界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台湾社会一个敏感却又不得不面对的议题。尤其在选举期间，族群问题往往会被作为炒作的议题。伴随而来的，涉及“国家认同”和“统独”争议。

台湾社会的“四大族群”（台湾少数民族、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并不都是一般民族学定义的“原生”意义上的族群，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建构性色彩。这种政治性和建构性体现于政治权力结构化和为争夺政治资源而对族群进行操弄的过程中。台湾族群问题已发展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深刻影响着当前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如何妥善处理族群问题，已成为台湾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共议题。

台湾不同族群的政治倾向，有其复杂的国际背景。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半个世纪的日本“皇民化”教育，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了很大的异化和动摇作用，使一些台湾民众在文化认同上与祖国产生隔阂。美国政府借 20 世纪 50 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将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并在 1954 年 12 月 2 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面对新中国力量的逐步强大，试图保留扶植台湾独立的可能，同时也为武装介入台湾提供法理上的正当性。美国就是要把台湾变成遏制新中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从此获得美国大量的军事与经济支持，台湾当局更加依赖美国政府，直至今日。

在台湾内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台湾旧有的威权统治和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已无法应对政治经济逐渐开放的社会，在新的法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台湾各地的族群势力竞相展现实力，纷纷拥“金”自重，并通过金权勾串建构利益联盟，赋予利益以正当性。于是，金权政治、黑金

漂白等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政商关系中的资本势力抬头，政商之间形成大小伙伴关系，使得地方社会政治出现新的格局，即派系垄断地方利益，或由分化的利益形成联盟控制地方利益。

由于台湾政治生态环境复杂，意识形态立场泾渭分明，为了在对立政治格局中求得生存，台湾传媒界也形成了“蓝绿分明”的媒体生态。几乎所有的重要媒体都有政治人物作为依托，同时也竭力为政治人物服务。激烈的媒体竞争助长了政治矛盾，媒体中立的伦理和道德化为泡影，沦为族群斗争的政治工具，对台湾政治与社会舆情产生重要影响。

族群问题是台湾特殊历史造成的一个客观存在。目前，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台湾社会的整体在现代化走向中逐步朝着族群和解的方向发展。然而必须承认，族群的界线虽开始淡化，但族群意识、族群心理和族群文化并未消失，相反在今日台湾有被重新炒作而扩大和深化的危机。把族群、族群意识、族群心理和族群文化不断地加以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是今日台湾政治乱象的根源之一。溯本寻源，了解台湾族群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对于我们分析台湾族群问题，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当有所助益。

本集子所收九篇文章即分别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台湾族群与政治生态以及相关问题。

杨华基

2012年9月

目 录

台湾族群问题的历史根源	刘登翰 (1)
台湾族群的构成与政治生态	刘传标 (11)
台湾地方派系与政治生态	刘传标 (64)
台湾政治生态中的族群文化影响及其消极后果	郭健青 (148)
台湾族群的政治化	叶世明 (178)
促成台湾族群问题的内外政治因素	杨华基 (204)
台湾族群生态中的政商关系与黑金政治	陈 萍 (217)
族群斗争背景下的台湾传媒	陈 萍 (239)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	单玉丽 (266)

台湾族群问题的历史根源

刘登翰

一、族群问题的泛政治操弄

族群问题是观察、分析当下台湾政治必不可少的一个视角。在台湾由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向政党政治的“民主转型”中，由于国民党政权治台以来对“本省人”所采取的防范、排拒等不当政策，所谓“民主转型”便包含了“民主化”和“本土化”两个向度。随着蒋经国的“解严”和“改革”，无论国民党自身还是其治下的“政府”，都有着朝向“本土化”发展的趋势，而“本土化”不能不涉及台湾人口最多的本土族群。与此同时，长期受到排拒的某些台湾本省人士——政客和知识精英，也活跃起来，利用长期受到压抑的本省族群的政治悲情，作为他们标榜代表“台湾人”利益的政治资本和组建本土政党的社会基础。在“解严”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充满政治缠斗的所谓政党政治，“统独”意识的尖锐对立，使本来较为单纯的族群问题蒙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政党和政客手中泛政治化操弄的工具，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台湾族群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更大的撕裂。

因此，解剖、认识台湾族群问题，是解剖、认识台湾社会和台湾政治的一个必要前提和基础。

族群，作为社会的一种构成和解构社会的一种方法，在西方政治社会学里，被称作“社群”。我们可以依照不同指标对族群（社群）进行不同的划分，例如性别、年龄、居住地区、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职业行业，

等等。不同的族群（社群）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历史形成背景和文化特征，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认同结构、政治认知和社会诉求。不过，我们所讨论的台湾族群，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所指称的“社群”。它是台湾特殊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产物；台湾族群间的差异和矛盾，也是在台湾特殊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和形成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诸如性别或年龄等差异所带来的。因此，要了解台湾的族群问题，便不能不深入到台湾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去。

概略地划分，一般认为台湾有“四大族群”，即台湾少数民族、福佬（或“河洛”，泛指早期来台的闽南籍移民）、客家和“外省人”。若再细分，每个大的族群还可以有若干分支，如台湾少数民族中有十多个不同的分支，被称为“福佬”或“河洛”的闽南移民有泉州府和漳州府以及各府属下不同的县籍之别，客家亦有粤客和闽客之分，“外省人”则是相对于早期移入的福佬和客家（所谓台湾“本省人”）的战后来台的大陆各省籍人士的统称。“四大族群”包含着互有交错的四重差异和矛盾：第一重是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汉族移民（包括早期闽粤移民和战后大陆的新移民）的差异和矛盾；第二重是大陆汉族移民中的“本省人”（即早期的闽粤移民）和战后来台的“外省人”的差异和矛盾；第三重是“本省人”的福佬与客家的差异和矛盾；第四重则是福佬和客家内部不同府、县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如果再深入分析，还有移民抵台以后因居住区域、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问题所造成的差异和矛盾。这些差异和矛盾，有的是不同族群间原生性的文化差异，但更多或更主要的则是在台湾移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因移入的先后、移居地域的不同、所占权益的不均等因素所诱发和激化起来的。这些历史累积下来的“宿怨”，本来应当在岁月的淘洗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弭和淡化。事实上，在台湾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不同族群之间也出现了某些互相包容和融合的现象。但近年来的发展恰恰相反，台湾的族群矛盾重新成为一个尖锐对立的问题，而且愈演愈烈，并逐渐积淀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一种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个中原因复杂，既根源于历史，又激化于现实。本文只侧重从历史的层面，对这一现实政治缠斗中恶性复发的历史“旧疾”做一些初步的分析，以作为分析、认识今日台湾族群问题的参考。

二、族群问题的历史透视

从历史上看,台湾是个移民社会。自晚明至清近三百年间,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使来自大陆的汉族移民人口,超过台湾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人口主体;同时,大陆移民携带来的汉族文化及其在闽粤的地域形态,也成为台湾社会的文化主体。它促成台湾社会发展中的两种转型:一是由以台湾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会向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转型;二是由流徙不定的移民社会向移民及其后裔稳定居住的定居社会转型。郑氏治台时期,其事业鼎盛时,移入台湾的汉族人口超过10万,已与当时的台湾少数民族人口相近或略有超过。至清代中叶,据道光《福建通志》载,嘉庆十六年(1811年)编查户口统计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达190万,而台湾少数民族各族人口,乃不及10万;后者不仅人口比例小,且多被迫远离台湾社会中心,居于内地山区或边沿海岛。而在台湾的汉族人口中,据陈亦荣《清代汉人在台湾地区迁徙之研究》统计,原籍闽南者占83%,原籍广东者占15.6%,其余为其他各省人氏。这一数字表明,台湾的汉族人口是以闽南人和客家人为代表;同样,由移民携带入台的汉族文化,除了其上层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士族文化外,大量的是以闽南和客家两种地域文化形态为代表的俗民文化。尽管台湾的移民社会经历着向定居社会的转型,然而,相对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文化有自己更加稳定、持久的特点,“移民文化”并不会由于“移民社会”的转型而立即消弭。即使移民的原乡文化在漫长的定居过程中融吸新居地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因素而发展出新的特征之后,这一文化仍然保留着来自原乡的移植性特征,代代相承地影响着后来社会的发展。

这是台湾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也是台湾族群问题生成的文化大环境。一方面,不同的族群秉承着以汉文化为主导和核心的共同的中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不同的族群也固守着来自他们原乡的地域文化形态,在方言、习俗、信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族群的认同结构。剖析台湾族群问题



不能不从他们的移民经历和各自原乡的文化认同方式入手。

考察台湾的移民史，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对移民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一）早期的大陆来台移民，大多是单身独人，或三五结伴地流入，极少有举家合族的迁徙。这与历史上中原望族的向外扩散方式，有很大不同。郑氏父子治台时期所带动的移民浪潮，属于战争性移民。除了领导集团中有少数家族，如郑氏家族、陈永华家族等之外，占移民人口最大多数的军队及招抚入台的沿海流民，多为单身青壮男丁。清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将大多数郑氏官员、军队及沿海流民遣返大陆或送归原乡，使台湾汉族人口，一时骤减过半。此后清朝政府一直严格掌控渡台人口，尤其严禁携眷入台。虽然私渡猖盛，但也多为单身男丁，春去冬返。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才诏许搬眷入台。其后又多有反复，至光绪初年，才完全开放。因此，台湾家族的出现，要迟至清代中叶以后，即开始移民一百多年以后才形成的。考察台湾的五大家族，雾峰林家的第一代传人林石，是乾隆十六年（1750年）入台的；基隆颜家的第一代传人颜浩安，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入台的；板桥林家的第一代传人林应寅，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入台的；而高雄陈家的发迹者陈中和，更迟至咸丰三年（1853年）才出生；鹿港辜家则更晚才靠辜显荣在日本侵占台湾时期的发迹，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由此可见，台湾家族的形成，应在乾隆以后或者更晚。台湾宗族社会的晚成，对台湾移民社会的构成方式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是以家庭—家族—宗族为基本单元的。家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组合方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村落的基本形态。它的重要特征是围绕血缘的传承与地缘互相涵化。由同姓同宗的血缘关系发展起来的村社聚落，考诸中国的地名辞典，如张家村、李家庄等地名，比比皆是。这反映了这种建立在地缘之上的宗族血缘组合，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聚落构成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台湾的情况恰恰相反。由于移民的单身独人徙入和渡台政策中的严禁携眷，宗族血缘聚落的形成，并非一开始就能出现。这种个别的、持

续不断的移民，往往需要同乡、同族之间的互相牵引和投靠，这就导致初期移民的组合方式，不以血缘性的宗族聚合即聚族而居为主，而是以地缘性的原乡组合即聚乡而居为主。尽管这种地缘性的原乡组合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宗亲关系，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乡缘关系。这种地缘性的原乡，可能是祖籍地的同一村庄，也可能是同一县府，甚至是同一方言区。地缘性的原乡组合，在早期移民中发挥着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移民的生活组合方式。初抵台湾的移民，举目无亲，唯有投靠乡亲熟友，渡过最初的生活难关。因此这种生活组合方式，也起着招引移民，为移民提供最初生活保障的作用。二是移民拓垦的一种生产组合方式。台湾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未经开发的恶劣生存环境，往往并非移民个人力量所能开发。特别是成片原始土地的开垦、水利的修建，无论财力、人力都需集合众人力量才能实现。原乡组合便起着这种组织生产的作用。三是移民的一种自卫组合。移民社会是竞争激烈的社会，为土地、为水源，各种利益冲突，时常引起火拼，同样需要集合众人力量。这种自卫性的力量组合，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既能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也可能转化为侵占他人利益的外侵性的恶性力量。

（二）移民的入台时间有所先后，其享有的开发权益并不均等。就闽粤两省而言，明代的台湾移民，主要来自福建，不仅早期开发澎湖的主要是泉州府人，明末郑氏引领的移民也主要来自福建的泉漳两府。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将台湾作为一个府置于福建省治下，其有所控制的渡台政策，也只开放福建一省，而以粤东“素为盗贼渊藪，而积习未忘”为由，“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①。至康熙后期，施琅殁后，禁令才渐为松弛。所以粤东客家移民来台，不仅人数少，时间也晚。早来的泉漳移民，占有自然条件较好的西部滨海地区和平原；迟来的客家，只好向开发较晚的山区进发。台湾的垦殖路线，首由中部而后向南北两端发展。具体而言，在明郑时期，移民最先驻足的是台南地区，然后一路向北发展；另一路由中部的鹿港登陆，开发彰化平原，康熙以后才由彰化渡过大肚溪进入台中。雍正初年以后，以漳州移民为主，由彰化沿八卦台地南拓至南

^①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一《武备志》。

投、草屯、雾峰一带。乾隆年间解除携眷之禁以后，大批移民涌入，才进一步由台中盆地向四面拓展，并开始进入丘陵山地。粤东移民的入台，大多在雍正初年以后。在竹塹、桃园、苗栗乃至东部宜兰平原的开发中，在泉漳两邑之外，大量出现了粤东陆丰、海丰、惠州、梅县等客籍移民的身影。这形成了移民沿着垦殖路线的分类居住形态。大抵而言，“以南北论，则北淡水，南凤山多广民，诸彰二邑多闽户；以内外论，则近海属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广东客庄”^①。

这种因移民先后而依垦殖路线的分类居住，常常因利益冲突而引发尖锐的对立和抗争。有清一代频繁出现的“分类械斗”，即是这种矛盾的激化。究其原因，有政治方面的，如吏治不兴，官府无能，民间一有争议，诉讼不清，便率众合族，私相争斗，以求解决；有社会方面的，如单身游民众多，民风强悍，如刘铭传所说的，“一言不合，拔刀相仇”；但从根本上讲，是经济上的利益争端，往往因土地和水源的争执，互不相让，酿成血仇。台湾地势，中部高山，两岸临海，山海之间缺乏大片平原过渡，以致河流短促，一雨成灾。粤人靠山，闽人靠海，形成利害两端。山洪来时，山区的粤庄急盼速泻，减轻水患，却造成位于滨海平原地区的闽村被洪水浸入；而少雨枯水季节，上游粤庄蓄水灌溉，却使下游闽村缺水耕作。此类争执酿成械斗，台湾史籍多有记载。如《凤山县采访录》记：“凤山下淡水各溪，发源于傀儡山。瀑，万顷汪洋，倾泻而下，分为数十重，虽地势使然，亦粤民筑坝截围所致也。闻前辈不许截围，欲使山泉顺流而放诸海，不为害于闽庄。惜粤民不肯，几成械斗，因弗果行，遂至溪流浩大，泛滥无常。”这种依族群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分类械斗”，可能是闽粤之间的“分类”，也可能是泉漳之间的“分类”，或者泉人联粤抗漳，或者漳人联粤抗泉，继而还进一步细化为闽客各县之间乃至行业之间的纷争，不一而足。

台湾移民社会这种地缘性的聚落组合和分类居住，是移民间族群划分和强烈的族群意识形成的社会基础。它基于移民初期个体生命依赖群体的生存原则。早期移民“聚乡而居”的分类居住，虽然对于移民初抵台湾时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四《上福节相论台湾事》。

的生存和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滋长了台湾族群划分的狭隘地域观念和帮派意识。

（三）政治的介入，使族群矛盾和对立升级、激化。台湾族群间的矛盾，本来就与彼时清政府消极的治台政策，导致台湾的文治不兴、吏治腐化、社会控制力薄弱有关。政府在民间的纷争中，又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要么坐视不管，任其械斗；要么插入黑手，分化瓦解，制造新的对立。特别当一些民间私斗延及官府或带有反抗官府的政治色彩时，清政府在镇压的同时，还利用、挑拨族群间的矛盾，借助民间对立的力量使其相互争斗。所谓闽人倡乱则以粤人制之，漳人倡乱则以泉人制之，反之亦然，从而造成族群间更大的对立和社会的撕裂。康熙十六年（1721年），闽人朱一贵起义，清政府就利用凤山县下淡水流域的客家义庄，以“拥清”为名，组织“义民”，进行抗衡。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漳州移民为基础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又同样以“拥清”为名，组织泉籍“义民”，参与镇压。此类事件在有清一代屡有发生。政治的介入，使本来较为单纯的族群间因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经济矛盾，改变了性质，使族群间的差异和矛盾转化成为政治矛盾，并且随着政治的操弄而扩大化和凝固化，“族群”渐渐蜕化成为政客骗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今日台湾政坛的族群操弄，在清代已经开了先河，只不过今日的政客，远胜于当年的清朝官员。

三、族群问题的文化心理根源

台湾的移民、移民人生和移民社会，从个人和群体两个层面形成台湾社会一个恒久的历史记忆，族群分类和族群意识深深地烙印在台湾人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性格之中，直到今日，仍在台湾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酵。尤其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观察和分析：

（一）祖国认同和对原乡认同的割裂。台湾的移民，是中原汉族南移闽南和粤东之后的二度移民。作为移民社会，台湾同样存在着移民社会普遍存在的双重认同，即祖根认同和本土认同。前者包含着移民及其后裔对



祖籍地的认同、血缘传承的认同和原乡文化的认同，在这一认同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大认同；后者则是移民自原乡（移出地）定居新土（移入地）之后，尤其是移民后裔，在与新土的共同成长中，对新土的认同，其中也包括了对血缘传延中新的融合的认同和对原乡文化在新土的自然文化环境中增长的新质的认同。这是移民社会和后移民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在台湾特殊的社会发展和历史遭遇中，这两种认同都表现出特殊性。特别是原乡组合的聚居方式，强化了移民依原乡分类的族群建构和移民与原乡的密切关系，移民的原乡文化和血缘认同也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保护。然而，台湾历史上曾经多次遭遇外来殖民者的入侵，尤其是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占领，殖民者虽然无法完全阻断台湾民众与原乡的联系和否认其血缘传承，却千方百计从意识上和文化上否定台湾人的民族归属和国家归属。把“原乡”和祖国割裂开来，只承认“原乡”，而不认同“原乡”所从属的祖国，是殖民者瓦解被殖民者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个惯用伎俩。即使到了民进党执政之时，情况仍然如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台湾民众的祖根认同，仅止于对原乡的血缘和文化的认同，而隔绝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强烈的分类意识。台湾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分类居住（首先是台湾少数民族和汉人的分类居住，其次是闽粤的分类居住，继之还有不同府、县和原乡村落的分类居住），强化了台湾民众的族群分类意识。这类原乡组合的分类居住，在利益保障上的一致性，使族群内部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抱团性”。愚忠于族群的“小团体主义”，往往使族群意识演变为帮派意识，使人们在族群或帮派的利益面前，一致对外，甚至不问是非，只唯帮派（族群）。

强烈的分类意识，使台湾的拜盟结社风气十分炽盛。各种名目的同乡会、宗亲会、神明会、祖公会、父母会、兄弟会等，以共同的利害关系为纽带，结成地域性、血缘性、行业性的各种帮派团体，其数量之多，常令统治者吃惊和警惕。据1919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当局调查，仅清代成立的带有宗亲性质的神明会和祖公会等，就达5159个，其成员占彼时台湾总户数的一半。为此清政府曾以“仁德衰而盟誓生，道德薄而诅咒兴”，谴责“动辄焚香祭酒，称哥呼弟”的拜盟之风为社会“恶俗”，而律令

“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千里”^①。但抱团结社之风植根于台湾特殊的社会土壤之中，并非一纸律令就能禁止。时至今日，陋习未变。结社拜盟之风，演化成今日名目繁多的各种帮派团体，渗入黑白两道。即使政党之中，亦有这派那系，成为政坛恶斗的标志和打手。而其部分帮派团体，发展为黑道社会，卖淫设赌贩毒，甚而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成为社会的毒瘤。有的勾结政客、玩弄政治，成为某些政客或政党背后的桩脚和金主。

（三）敢于拼搏开拓和不惜冒险犯难，是台湾移民拓殖性格的两面。闽粤移民赴台，虽然隔海相望，却风波险恶。尤其在清政府的限制入台政策之下，多以私渡渗透，而客头贪利，罔顾行险，每每酿成海难事故。侥幸抵台之后，多数移民缺乏资金、技术，只能选择原始的农业垦殖。台湾自然条件虽好，但未经开发的蛮荒土地，仍需移民付出加倍的艰辛，才能有所收获。而在移民之间，形成不同利益圈子，竞争激烈，往往为了一点资源，刀血相仇，在艰辛的垦殖生涯中，徒生变故。凡此种种，正反两种境遇都培养了移民坚忍克难的不屈性格和拼搏开拓的冒险精神。移民所来自的原乡，无论闽南还是粤东，都是中原汉族南徙新拓的疆土，同样历经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艰辛途径，也同样需要通过拼搏才能有所开拓。移民原乡的这一地域文化性格，在他们二度迁徙入台的艰辛人生中，有了更好的弘扬。台湾一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准确地抓住了移民面对厄运勇于拼搏的精神特征，体现了包括客家的“硬颈”精神在内的台湾移民的典型性格。

当然，抽象地肯定“拼搏”精神，也潜藏着另一种负面因素。清治初期，社会建制并不严密，各方面都留有许多政策漏洞。移民在面对重重困难而利益和诉求得不到保障和实现时，便往往利用政策漏洞和吏治疏失的空间，不惜冒险犯难，谋求不当利益。加之移民成分较为复杂，单身男丁居多，且间杂不少游民；他们居无定所，常以嗜酒赌斗为乐，每遇争斗，则充当亡命；其所来自的原乡，无论闽南还是粤东，也都是民间私斗极盛的地方。由此移民养成了民风强悍、逞强好斗的习气。抽象地提倡“敢

^① 陈文达：《台湾县志》卷十，《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234—235页。



拼”，客观上也造成对于不问是非、只认利害而敢于铤而走险、冒险犯难的负面性格的肯定。

移民拓殖性格中积极的拼搏进取和消极的冒险犯难，从正反两面对台湾社会影响深远。从积极一面看，促进了台湾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从消极一面看，则在台湾社会的发展中埋下种种危机。今日台湾族群意识中的不问是非、只认帮派，乃至黑金政治和黑道猖獗，都与此不无关系。而政坛的恶斗，无论早期的街头，还是当今的议会，不断演出大打出手的“全武行”，相信暴力，拳头第一，种种与现代法律社会相悖的非理性行为，亦是当年所谓“冒险犯难”精神的负面延伸。

（四）台湾是在甲午战败之后作为战争赔偿割让给日本的，此后半个世纪的殖民屈辱，使台湾民众产生“孤儿”兼“弃儿”的悲情意识。战后台湾回归，台湾民众曾经热烈地欢迎“国军”，期盼着一种摆脱“二等国民”，重获主人公尊严的“出头天”的日子。然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及为清除日本殖民影响而把台湾人视为一种“原罪”的错误政策，使台湾民众在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之后，重新感受“孤儿”兼“弃儿”的悲郁困境。在台湾政党政治的恶性缠斗中，这种悲情意识最易被挑唆和利用，将历史上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带给台湾民众灾难的旧账，算在新中国政府和大陆人民头上，不断制造和深化大陆和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社会对立和族群对立。更有甚者，利用台湾民众期盼“出头天”的心理期待，煽动“台独”，将族群对立进一步转化为“统独”对立，使之成为某些政党和政客政治算盘中的如意棋子。

族群问题是台湾特殊历史造成的一个客观存在。然而，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已经使导致族群矛盾对立的一些客观因素消失和淡化，社会整体在现代化的走向中朝着族群和解的方向发展。然而必须承认，族群的界线虽已淡化，但族群意识、族群心理和族群文化并未消失，相反在今日台湾有被重新炒作而扩大和深化的危机。把族群、族群意识、族群心理和族群文化不断地加以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是今日台湾政治乱象的根源之一。溯本寻源，了解台湾族群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对于我们现实地处理台湾族群问题，应当有所助益。

台湾族群的构成与政治生态

刘传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结束，国民党军政人员等约180万人退踞台湾，蒋介石于1950年1月3日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暂驻台北”的名义在台湾接管政事，开始了在台湾的偏安统治时期，开展了以巩固蒋氏为台湾统治中心为目的的第一次政经改造运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批党政元老、派系首脑、军队领袖挤出决策圈，整顿各级组织，党员重新登记，发展新党员，培养“两蒋”（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下同）嫡系的新实力派。

蒋介石主导台湾地区政治时，把在大陆的组织架构搬到台湾，大陆省籍人士多占据所谓“中央”高层权力要津，只有极少数台湾省籍精英象征性地参与地方政权。

20世纪7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从岛内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台湾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较大的变化，出现了新兴的地方财团势力及由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部分公教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中产阶层希望分享政治权力、扩大政治参与，要求打破大陆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愿望日趋强烈；台湾国民党当局保守僵化的统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从外部看，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29日，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并终止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当局遭遇一连串的“外交”失利，在国际社会上日益陷于孤立，使台